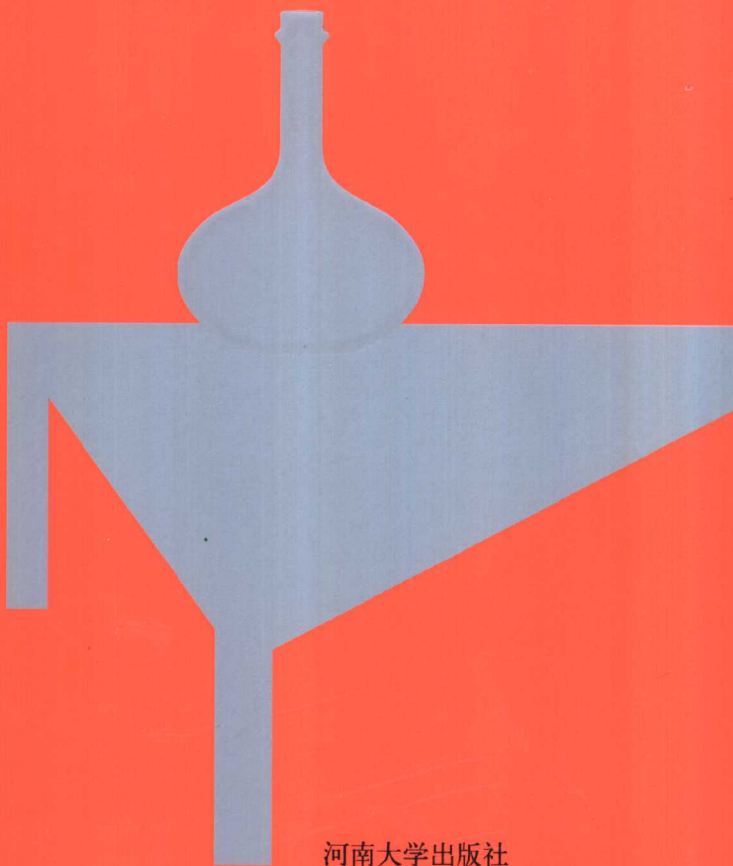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主编 陶东风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主编 陶东风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陶东风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9

(新思潮文档/金惠敏主编)

ISBN 7-81091-087-6

I. 知… II. 陶… III. 知识分子-文集 IV. D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286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责任校对 张文礼

责任印制 苗 卉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50mm×960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44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7-81091-087-6/I·202 定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金惠敏

总 序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相对于“文革”的“新时期”，那确乎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峥嵘岁月。不过今天从思想史或者思想创新的角度看，“新时期”之“新”似乎仅具有拨乱“返”正的意义，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远承“五四”精神，近接50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关注的主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性、异化、马克思手稿、美的本质、现实主义等等，均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时而低抑、时而高亢的老话题，而且，“左”、“右”对垒，阵线分明。“右”者坚信只要冲破“左”的禁锢，前景就是一片光明；而“左”者则认定，“右”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动乱、无序和资本主义复辟。那时的“思想解放”其实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解放，要么就仍然禁锢着。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对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单纯而幼稚、激情而盲目，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

进入90年代，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当我们感觉“新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思想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思维创新的佳境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它总是晦暗不明，难分难解，相互渗透，多种可能性并存。具体说，90年代的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它呈现出思想作为一

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来,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家、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传媒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题为其语境。

但是如果将思想还原为现实,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思想界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传统发扬光大,如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让传统自己说话,而在中国则除了这层任务之外,更加之以如何与西方这个“他者”相对话。“传统”与“他者”可能就是当今最大的哲学问题。

将这些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熟或者完成使命。应该承认,这些思想还嫌稚嫩,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定论。但是,它们是我们走过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更蕴涵着无限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那么这些文本之作为历史资料的参照意义甚或作为思想地图的指示作用将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我者,罪我者,我们一概表示感谢。

惶惶然,谨此为序。

2003年8月29日

北京花园村

陶东风

导 言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功能是什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介入、独立自主与公共关切、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而又极富争论的领域。在西方，一方面有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古德纳）；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家与技术官僚。在中国，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良知的作用；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而且也不可能继续发挥传统的启蒙导师的作用，“后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来临。

本人认为，出现“知识分子”讨论热潮的原因是：当今世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知识界都遭遇到了严峻的现代性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的问题从来是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只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并引起强烈关注。这样，我们对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几乎全部都是研究现代性的学者的现象就不感到奇怪了。

上篇 西方学者论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从知识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有些人从职业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人，也有些人把是否具有超越的普遍关怀、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是否以生产批判话语为己任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其实，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知性认识。重要的是把历史上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与界定放在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把握而不要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历史地看，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 19 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尚处于前现代社会，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俄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带着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与知识背景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对自己所处的俄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的现行秩序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他们只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是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从这个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参与精神和批判立场，以人类良知与普遍价值的代表自居，相比之下，他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倒并不具有界定性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个词源学来源来自 19 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 1894 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诬陷。这一事件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 1898 年 1 月 23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为社会伸张正义、敢于批判最高权力当局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19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

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具有反抗性的波希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①

无论是在俄国还是法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一般局限于自己的狭隘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与职业型学者显然都很不相同,他们必须站在普遍性、超越性的立场参与社会现实。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知识分子批判话语的合法性既然是他的超越性、普遍性与公正性,那么,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被赋予这种超越性、普遍性与公正性?或者说,谁能够赋予他们这种权力或权威?几乎所有质疑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反对或修正现代知识分子概念,原因正在于他们都深刻地质疑普遍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症状是:宗教对于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之整合与规约能力宣告破灭以后出现的“诸神纷争”状态。赋予世界以普遍意义与秩序的源头——“上帝”死了,谁来取代他?“上帝”死了以后谁是普遍性(普遍价值、普遍真理)的代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有无资格充当这个角色?这涉及鲍曼所说的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这样,现代性问题(诸神纷争)与着手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分子本身的现代性问题就纠结在了一起。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集中表现为:知识分子有没有资格获得原先只有“上帝”才拥有的赋予世界以普遍意义的合法性?

对此做肯定性回答的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经典表述之一是社会学家曼海姆给出的。^②在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曼海姆对知识分子做过一个经典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而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阶层。把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正因为这样,用社会—经济阶级地位的社会学分析来讨论

^① 参见本书许纪霖文《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② 顺便指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界,曼海姆的定义也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启蒙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问题是注定不得要领的。知识分子的关键特征是“自由飘浮”与“非依附性”(free-floating, unattached)。而恰恰是这种“无根性”、疏离性是知识阶层可以超越狭隘的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意识形态褊狭,进而达到普遍、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基本前提与必要保证。由于现代知识活动(在曼海姆看来)是由一个不依附于任何阶级、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不局限于社会中的某个给定位置的知识界来承担的,知识分子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谎言(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是与“乌托邦”相对的概念,特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的揭露者。“非依附性”与“自由飘浮”是知识分子获得思想的公正和自由的条件。

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遭遇的批评来自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另一个是后现代主义阵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很有些“自由化”的味道,缺乏阶级分析的眼光(而且曼海姆本来就抵制这种分析方法);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属于典型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正是这一点受到利奥塔、福科以及布尔迪厄等具有后现代思想特征的学者的严厉批评。从后现代的观点看,这种知识分子理论带有深厚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① 普遍性正是后现代主义要竭力解构的“宏大叙事”。一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科)根本就怀疑所谓超越的普遍性和真理,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权力或话语的产物而已;而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处于特定的知识场域与社会权力场域中,他本身也不能免于反思社会学的反思。

显然,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是非常理想化的。在充满了利益纷争和复杂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曼海姆设想的超然于各种利

^① 对曼海姆的知识分子观念的批评,除了本文提到的以外,还来自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有人指出,曼海姆所谓知识分子是“无阶级的”或“非依附的”,模糊了社会结构与精神劳动之间的联系。参见 Carl Bogg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lbany: SUNY Press, 1993, pp. 92-94;其次,有人质疑道,曼海姆极力主张知识的训练和无阶级性使得知识分子可以获得某种超然的视角和观念,但这位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却无法确定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社会根源。参见 Paul A. Bove, *Intellectuals i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益集团之上的“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在经验的意义上即使不是绝对没有也是十分罕见的。现实中到处可以见到卷入特定社会运动及阶级关系,且有自身利益诉求的具体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更为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想化的自由主义的不满之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有理想,而且是非常高远的理想。但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时,它又是惊人地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把知识分子拉回到现实中来并使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使命。这种知识分子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

作为一个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葛兰西本人就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必然强调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集体性和阶级有机性。葛兰西认为,新型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前者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确立的结果。而意识形态霸权或文化领导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并不是以暴力方式确立的(由于这个论断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故不可机械搬到中国),而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制度形式(诸如教育、出版、大众媒介等)使广大社会公众(包括被统治阶级)“默认”统治阶级的观念和价值。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他在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维护或解构意识形态霸权或文化领导权、塑造公众“常识”方面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当然,他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提出并强调这个问题的。葛兰西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家,他最关心也最苦恼的问题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热情与革命意识。他的结论是: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革命意识,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又成功地控制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所以,革命的前提必须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如果说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依然属于现代性理论范畴,依然是一种宏大叙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其对曼海姆知识分子理论的批判是一种现代性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批判,那么,后现代主义大师福科的知识分子理论则主要属于后现代主

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福科的批判理论具有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但同时,福科又是一个激进的批判思想家,这使他的知识分子理论显出深刻的张力。出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立场,福科质疑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s),同时也考虑到现代社会分工与知识专业化的事实,福科清醒地意识到了“普遍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以及专门知识分子诞生的现实根源。福科并不想超越这种局限回到传统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上去(在福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革命理论依然是值得警惕的现代性宏大叙事)。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福科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认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自居,作为普遍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即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衰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①福科把这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称为“特殊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又译为“专家型知识分子”、“专门的知识分子”等)。在他看来,从普遍知识分子到特殊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转换,既是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趋势。

但是,福科并不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作为著名的激进思想家,福科依然坚持在专业领域里如何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进行“游戏战式”的对中心和霸权的颠覆。这一斗争策略导源于福科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普遍倡导的“微观政治”,是微观政治在知识分子理论中的体现。从他的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的理论出发,福科认为普遍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本身也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的“超人”,他们一方面受权力影响,另一方面又传播或扩张权力。与简单地怀念或呼唤普遍知识分子的人不同,福科清醒地意识到知识

^① 原载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ou books), 1984, 中译载《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分子在权力话语和专业分工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困境。在福科看来,专业主义或知识从总体化向局部化的转变并不是件坏事。他认为,理论也好、政治也好,本身就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最微小的抵抗都将演变为颠覆”(德勒兹语)。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一样,福科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以及尼采所说的“视角主义”。在权力无处不在的话语和学科活动中,局部性和零散性反倒给了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以从事“反话语”或“反记忆”的自由和可能。

显然,福科的“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概念对应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也是一种逻辑的划分。如上所述,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的确与现代性的命运密切相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普遍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解释世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使命掌握在“上帝”及其代言人牧师手中,正是神学世界观的解体导致了一个新的世界意义的建构者——普遍知识分子的产生。而知识分子的危机也总是体现为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宣告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危机。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也总是结合着对于知识分子角色与使命的重新思考。在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中,立法者与阐释者这两种知识分子范型正好对应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社会文化范型。但是鲍曼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这种变化既没有欢呼雀跃,也没有强烈抵制,而是更多地秉承了韦伯“价值中立”的立场。在鲍曼看来,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浮出历史的现代知识分子属于“立法者”角色,他们自认为拥有担当一个国家“集体良知”的能力,进而在国家内既超越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分工,又超越党派的利益集团的划分,他们捍卫和鼓励的是国家的最高价值。知识分子是通过他们职业责任之外的所作所为来体现其特征的。

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他们的出现是和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密切相关的。鲍曼所谓“立法者”类型的知识分子基于启蒙时代的理念:随着神学世界观的解体,无论政府还是个体,其行为的基础都应该是理性,必须依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导致了“有知者”的权威地位,而这一权威可以描述为“立法的”,“立法”权利要求整个社会

都服从具有“更好的判断力和卓越的知识”的“有知者”确立的法规,这就把知识分子本身的“立法者”角色合法化并赋予其某种资格。

随着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被后现代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取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也从“立法者”变成了“解释者”。解释者的本体论基础是:只有语言被认为是现实的本质,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主体间性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知识绝对没有超越语言学的真理标准,知识只能在知识共同体认可和共有的谱系中才能被把握。知识共同体的多元性导致“真理”话语的多元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被界定为一个“解释的”事业,他不但认识到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而且整个地改变了文化的观念,文化成为一个被研究的对象,一个只能在认识上作为“意义”加以把握的事物。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还牵涉到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从政治的主角蜕变为政治的阐释者。这个变化使知识分子退守到文化阐释领域,知识分子由此既摆脱了国家政治权威的直接控制,同时也与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拉开了距离。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被“非政治化”了。在后现代社会,现代性以及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那么,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变化了的语境中到底应当与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角色的研究中,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显得独树一帜。正如周宪所指出:“曼海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想像,是一种自由不拘的特立独行者,而葛兰西宁愿强调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依存关系。两种知识分子的想像各执一隅。”^①周宪认为,处于这种两极的界定之间的,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天马行空者,又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成分。知识分子自己就是一个新阶级。

古德纳认为,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最先在旧阶级所拥有的公司、商行或机构工作,渐渐地,由于教育系统和专业知识发展,他们与这些公司或机构分离开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阶级意识

^① 参见本书周宪文《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

或公共意识形态——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集体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级。虽然并未对旧阶级公开批判，但专业主义则是新阶级对技术上和道德上高于旧阶级的优越性的心照不宣的要求……专业主义造就了对新阶级合法性的核心诉求，这悄悄地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①

在分析新阶级的时候，古德纳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本”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知识阶层与生产方式的特殊关系全然有别于资本家阶级。他们拥有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的文化资本。而且随着社会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介社会”等等，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的优越地位。过去拥有厂房和机器的人就拥就资本，如今拥有教育和知识的人同样也就获得了资本。这样，文化资本的拥有使知识分子新阶级既有别于传统的统治阶级又不同于劳动阶级。

古德纳新阶级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CD），这是新阶级创造的一种特殊文化，并因此成为一种“言语共同体”。这种批判的话语文化不仅使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而有别于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还使之有别于旧的官僚阶级。批判话语是新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共同的兴趣。这种批判话语文化有三个语法规则：第一，强调对论点的理性证明；第二，证明的方式与论辩以外的任何因素（如权威、社会地位等）无关；第三，在论辩基础上达到自愿的而非强制的认同。显然这个界定具有非常突出的理想化色彩（可以参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知识分子新阶级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基本角色与功能就是发展批判话语文化，他们因此成为真正具有革命潜能的阶级。

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引发了众多的争论。有些批评者指出：新阶级理论没有解决的基本矛盾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亦即公共性与专业性的矛盾。古德纳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自足和自治性获得的积极意义，但他对专业化、科层化和合理性所带来的问

^① 参见本书周宪文《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

题,特别是对批判话语文化的限制,以及理论自律性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理性趋向于工具性等消极现象,显然认识不足。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的事实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型专家阶层,也极有可能,而且事实上已经转化为技术官僚。晚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思路,就是专业化与公共性、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古德纳过于乐观地认为专业主义不但给予知识分子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且会扩大其批判话语的公共领域,那么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研究者所看到的却正好是事实的另外一面:在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和合理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与批判功能以及公共性的消失。专业主义导致知识分子批判话语萎缩,导致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日益严重的隔阂(可以参照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萨依德。周宪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好像是专门针对古德纳理论偏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修正。”^①在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出台十多年以后,萨依德出版了《知识分子论》。在这期间,萨依德发现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力量似乎一直在衰落,而原因就是日益严重的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②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依德激烈地批判现代社会专业化的牢笼已把知识分子囚禁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丧失了公共性,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而没有了公共性,也就谈不上批判性。这样,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专业态度”。专业化不仅导致了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制于狭隘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倾向技术上的规规矩矩,而且也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崇尚专业知识和专家资格。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因而知识分子便遵循并引证权威的语言,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和削弱了正确的理论探究。最后专业化还使得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屈从于权力和权威,屈从于权力的要求或为权力

① 参见本书周宪文《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

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萨依德的思想渊源之一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福科的权力/话语理论(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但就知识分子问题而言,福科对于萨依德的影响似乎并不大,特别是福科的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

所直接雇佣。针对这种专业化趋势,萨依德呼吁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在萨依德看来,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该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流亡者”、“边缘人”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不妥协的批判意识和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①

其实,萨依德和古德纳一样都看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倾向,而且都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认为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超越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显然受到了曼海姆的影响。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普遍性和真理的代表,但是作为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后殖民理论家,萨依德又警惕普遍主义的危险,所以他又补充说:“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局部、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正如周宪所指出的,萨依德“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分子都处于特定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超越这些局限来追求普遍标准(他把普遍设定为超越这些局限),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萨依德在指出没有什么定则来规定知识分子该说和做什么的同时,又坚持认为存在着普遍的超越的标准看法。这些矛盾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困境。此外,萨依德对于专业主义危害的剖析固然入木三分,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依托,他的普遍关怀与其他人的情绪化的、有时是非理性的“牢骚”会有什么区别呢?最后,专业化在导致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的隔阂的同时,是否也保护了知识生产不受外力的粗暴干预?保持了知识领域的独立游戏规则?如果结合中国的情况,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具有实际的意

^① 参见本书周宪文《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

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知识分子的专业活动缺少基本的独立性,致使外在的政治力量得以轻而易举地大规模入侵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结果是文化生产没有基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在此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话语的建立。所以,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知识分子的专业和普遍政治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对新阶级理论的另一批评来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通过对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既矛盾又联系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布尔迪厄得出了他著名的知识分子定义——“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部分”。这个定义显然不同于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布尔迪厄区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是前者在资源占有(因而也是权力占有)方面的优势。凡是拥有大量资本(不管是文化资本还是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的人即为统治阶级。但是在布尔迪厄看来,统治阶级内部依然存在区别,原因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分配不均、强弱不等。例如,艺术家、科学研究员和教授等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而工商企业家则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优劣、上下位置之争。相比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弱资本形式。这样,相比于没有或只有非常少资本的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而相比于统治阶级内部占有大量经济资本的那部分人,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属于被统治者。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部分”或者“权力圈中的被统治一端”这个定义即由此导出。也就是说,就阶级地位而言,知识分子处在既统治又被统治的矛盾地位中。从根本上说,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自足性只是相对的,远不如精神生活崇尚者所夸大的那么完美绝对。布尔迪厄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这个知识分子定义,与一般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像(自我设计的形象)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知识分子的这种暧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暧昧立场。他们的地位既与统治阶级有相似的一面(都是统治者),又与被统治阶级存在同型性。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下层社会群体的联盟常常是脆弱的,他们的反专制、反特权的叛逆性也是暧昧的,而不是坚定的。他们有时可能与被统治者结盟以反抗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阶级,但又极易被后者所收买或招安。

也正因为这样,布尔迪厄并不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构成一个特